

21

世纪国际政治丛书

EASHIYISHIJIGUOJIZHENGZHICONGSHU

西方 政治思想史

唐士其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1世纪国际政治丛书

西方政治思想史

唐士其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政治思想史/唐士其著.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5
(21世纪国际政治丛书)

ISBN 7-301-05604-4

I . 西… II . 唐… III . 政治思想史 - 西方国家 IV . D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7049 号

书 名: 西方政治思想史

著作责任者: 唐士其 著

责任编辑: 耿协峰

标准书号: ISBN 7-301-05604-4/D·060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 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27

排 版 者: 高新特激光照排中心 62637627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20.75 印张 520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3.00 元

《21世纪国际政治丛书》编委会

主任 梁守德

副主任 方连庆 潘国华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叶自成 许振洲

杨淮生

金娟萍 黄宗良

目 录

绪论 西方政治思想概述	(1)
一、西方政治思想的概貌及其发展阶段	(1)
二、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基本问题	(16)
三、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以及对政治思想史的解释	(30)

第一部分 古代希腊的政治思想

第一章 理性的政治	(40)
一、古代希腊文明与西方政治思想的起源	(40)
二、习俗、自然与理性	(49)
三、理想的政治与现实的政治	(58)
第二章 国家的起源与目的	(70)
一、公民与城邦	(70)
二、秩序、正义与平等	(82)
三、城邦之后的政治与人	(91)
第三章 政体及其更迭	(100)
一、政体的划分	(100)
二、政体的更替	(108)
三、混合政体	(113)

第二部分 古罗马和中世纪的政治思想

第一章 从世界帝国到民族国家	(123)
一、公民及其权利	(123)
二、法、自然与国家	(129)
第二章 精神的权力与世俗的权力	(139)
一、上帝之城与尘世的帝国	(139)
二、教会对于国家权力的侵蚀	(148)
三、向国家的回归	(157)
四、对于暴政的抵抗	(167)

第三部分 近代西方政治思想

第一章 国家的政治和法律基础	(176)
一、君主和国家	(176)
二、主权、“利维坦”和专制主义	(188)
三、政治与道德以及近代政治学的诞生	(203)
第二章 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214)
一、自然法与社会契约论	(214)
二、自由、财产和生命的权力	(227)
三、自由的政治意义	(239)
第三章 权力受到制约的政府	(254)
一、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254)
二、有限政府的理论	(262)
三、分权学说和分权的设计	(269)
第四章 平等、自由和民主	(284)

一、人人生而平等	(284)
二、民主的可能性	(292)
三、民主与自由	(310)
第五章 社会改良、社会批判与社会运动	(323)
一、社会改良主义	(323)
二、“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运动	(340)
三、马克思主义	(354)
第六章 政治中的理性以及对理性政治的反叛	(377)
一、保守主义的哲学与政治理论	(377)
二、理性、历史与国家	(397)
三、法西斯主义	(414)

第四部分 20世纪西方政治思想

第一章 主流的政治思想	(430)
一、自由主义	(430)
二、多元主义	(445)
三、精英主义	(461)
第二章 批判的政治思想	(476)
一、社会民主主义	(476)
二、女性主义	(490)
三、环境保护主义与绿色运动	(507)

第五部分 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及其方法

第一章 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产生及其早期发展 ——对于“伟大传统”的发现	(523)
--	-------

第二章 20世纪50至70年代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	
——政治哲学的复兴	(533)
第三章 “语境主义”和“语言的政治学”	(556)
附录一 地理与政治	(573)
一、从政治地理学到地缘政治学	(573)
二、以麦金德为代表的地缘政治理论	(585)
三、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地缘政治理论	
——一种“世界观”	(595)
四、战后的地缘政治学	(606)
附录二 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代表性人物,其著作与生活的年代	(627)
参考文献	(632)
后记	(651)

绪论 西方政治思想概述

一、西方政治思想的概貌及其发展阶段

从地域或者外延的意义上说,西方政治思想主要指的是西欧和北美的政治思想,因为在这一地域范围内,从人类的政治历史过程来看,人们关于政治的思考表现出某种完全可以识别的一致性与继承性,从而与世界其他地区对于政治的理解形成明显的区别,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思维体系。^①

至于西方政治思想的内容,也就是人们对于构成政治生活的各个要素的理解和关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则表现出不同的侧重与特点。与此相适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人们对于政治这一概念的基本特性的认识也有所不同,从而政治思想的面貌也就相应地表现出不同的变化。比如说,在古希腊,政治与城邦完全是同一个概念(*polis*)。这就意味着在这个时期,政治尚未从社会生活的整个领域中明确地区分出来,政治活动也就非常自然地被人们理解为延伸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谈论公与私、国家与社会这些后世西方政治学的重要范畴就几乎没有实际意义,而事实上在当时这样的观念也根本不可能进入人们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也可以被理解为“城邦学”,因为它所考察的的确就是构成一个良好的城邦所需要

^① 某些思想史研究者如 Quentin Skinner 对此是有所保留的。但是,尽管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的确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但与东方的政治思想相比,其内在的一致性却是无法否认的。

的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基本条件。

古希腊这种“泛政治”的观念到罗马帝国时期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两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国家领土范围的明显扩大使古希腊那种全民参与政治的体制已经变得根本不可能,当时的社会联系和交流手段同时也决定了公民个人生活与国家的政治活动的疏远——当罗马作出的决定必须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被在帝国边远地区生活的人们所知晓的情况下,是完全没有任何理由要求公民把政治活动作为其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的。反过来,就公民自身来说,在帝国的政治体制之下,他们也已经完全不可能像古代希腊人一样通过参与政治活动而获得他们人格的完善。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人是政治的动物”。^①但在罗马帝国,这个概念显然已经完全不能适用。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在古希腊时期哲学也构成了政治思考的一项主要内容的话,那么到罗马时代,人们就不得不到政治之外寻找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哲学依据。这正是罗马帝国早期斯多葛学派的理论在知识分子当中普遍流行、而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也居然关心灵魂的完善胜于国务的一个重要原因。

罗马帝国时期出现的这种哲学与政治的分离以及它所带来的人们在精神上某种程度的空白(毕竟不能让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没有任何文化和知识的普遍民众依靠哲学生活),为基督教在整个帝国的流行提供了一种非常适宜的精神土壤。另一方面,基督教在帝国范围内的普遍传播,教会组织在各地的建立,又对帝国的政治和政治思想带来了进一步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产生并不是一般的政治与宗教的关系的结果,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会自身特性的产物。基督教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对世俗的政治权力采取了一

^① 吴寿彭译为“人类自然是趋向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页。

种疏远乃至对立的态度，两者之间理想的关系形态是相安无事，各司其责——“上帝的东西归上帝，凯撒的东西归凯撒”（当然两者常常表现出一种时而合作，时而斗争的关系）。由此一来，一方面关于人的精神的事务在很大程度上从国家的统治之下独立出来，古希腊的政治概念由此而明显萎缩；另一方面，教会事实上作为一种世俗权力的存在以及它与国家权力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又为政治生活增添了许多原来所没有的内容。这一点只要对罗马帝国及中世纪时期与古希腊时期的政治学著作稍加对比，就能明显地看出来。

进入近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之后，西方政治的观念与实践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近代政治思想一个最根本的出发点是对个人利益的保护，这一点对于即使是像霍布斯那样的被视为专制主义者的理想家来说也同样是真的。当然，这种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政治观念首先是通过洛克得到了系统的表述。由于个人在追求自己的财富和利益的时候被认为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因此国家需要做的只是对个人的所得和基本的社会秩序加以维护，即承担一种“守夜人”的角色。不仅如此，由于像洛克那样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自然地具有一种侵害个人利益的倾向，所以人们普遍相信必须以种种方式对国家的行动能力加以限制，换言之，国家不过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恶”。用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家诺齐克的术语来说，这就是一种“最小限度的国家”，从而也就引出了一种“最小限度的政治”的观念。

洛克奠定的对政治的自由主义的理解是迄今为止西方政治思想中主流的观念。在这一思想传统中，政治只被认为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极小的一部分，国家与市民社会、公与私的界限得到明确的区分。也可以说，自近代以来，西方思想中的政治这一范畴是其历史上内涵最小的时期。当然，另一方面，即使在这一阶段，在西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候、不同的思想流派之间，对于政治的理解

也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比如说，在近代的德国，人们对政治的理解就要比英美等国宽泛得多。但无论如何，基于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仍然占据着统治的地位。虽然与洛克的时代相比，现代国家的活动领域已经有了明显的扩大，但政治观念以及国家政治活动的范围的任何一次哪怕是很小的扩展，都必须通过大量的理论上的论争甚至实际的政治斗争才能实现。

上述只是对西方思想中政治范畴的演变过程的一个非常抽象和概括的介绍。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演变虽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表现出某种阶段性的断裂，但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它们又是在一个大致确定的传统之中发生的。这里就涉及到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即这一历史的整体性问题。对此，人们的认识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在西方早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整个西方政治思想的历史被视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后代的政治思想也相应地被认为是古代希腊思想完全合乎逻辑的发展。这种观点有点类似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也就是说，是一种在一粒橡树的种子中已经包含了一棵完全长成的橡树的全部特质的思想。按照这种看法，古希腊以后全部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在本质上并没有增添任何新的内容，而只不过是对于古代思想的逐步展开。这一思想史观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西方政治思想进行神秘化的理解的产物，同时也是西方思想优越性的观点的反映。

那么，如何理解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呢？应该说，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确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但这种完整性却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已经被预定好的，它是西方历史独特发展过程的产物，是在古代希腊思想的基础之上，通过吸收古罗马和基督教思想，以及日耳曼民族的政治传统和法律传统而逐步形成的一整套思想体系。上述几个方面的影响对于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与演变具有重要意义，也可以说，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个部分，今天的西方政治思想都会是另外一种情形。

古罗马与基督教思想以及日耳曼传统对于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与上述这一思想传统中对于政治的基本范畴的理解的变化是相一致的，同时也把这一思想的发展划分为几个明显的历史阶段，可以相应地称之为古希腊的政治思想、罗马和中世纪的政治思想以及近现代的政治思想。

古代希腊人为后代西方政治思想提供了基本的思维模式、概念体系(也就是基本的思想素材)、理论框架以及关于政体类型等方面的基本思考，除此之外，还有民主政治的理论与实践。古代希腊文明对于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根本性的影响就是决定了这一思想迄今为止对于政治问题加以认识的基本模式。一般认为古希腊有系统的政治思想是从苏格拉底开始的，而苏格拉底之所以被视为希腊政治思想的开端则是因为他开始把希腊人对于自然的研究转向了对于人类社会的关注。但是，这种转变只是研究对象的转变，至于希腊人探究自然现象时所采用的基本的思想方法，即逻辑和理性的方法却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苏格拉底希望做到的，实际上就是在人类社会生活领域与在自然界一样，寻找到某种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理性与逻辑的思想方法的核心是不允许在思想中存在逻辑上的矛盾。早期希腊的哲学家们正是依据这一基本原则对于整个世界的起源及其运动规律进行推论。^①严格依从形式逻辑的思想方式当然带有浓厚的形而上学特点，但对于严格的形式逻辑的遵从，即使是在早期具有明显的辩证法思想的哲学家如赫拉克利特等人当中，也是一个基本的思想特征。这一思想方式在苏格拉底所创造的“辩证法”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辩证法”的一个主要特点就

^① 比如说，有的哲学家认为，世界从根本上说是静止的，其原因就在于，首先必须承认世界是完美的，而某一运动的事物，不是向更完美，就是向不完美运动，不论如何，只要这种运动存在，便可以证明在运动中的事物并不完美。由此可以推断，世界是静止的。

是通过对话发现对方思维中的逻辑矛盾，并通过寻找解决矛盾的途径而达到对话双方都认为是正确的结论。

理性与逻辑的思想方法成为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为后世所继承，这一点甚至在基督教神学家当中也不例外。在他们那里，即使上帝也必须遵循逻辑规则。与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政治思想相比，如果说中国的政治思想主要是通过对于自然的类比，通过对人事的推演而得出各种政治结论的话，那么西方政治思想则始终从某种被假定的前提出发，通过逻辑推论而得出包括秩序、权利和义务，平等和自由等等一系列的政治范畴，以及由它们所构成的一些严密的理论体系。

古代希腊思想方式中理性的特征在其思想的内容方面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结果，那就是关于自然法的思想。自然法的思想应该说不是古代希腊所特有，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中也有“天道”、“天理”之类与人间实际的政治秩序相对的观念。希腊思想中自然法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理性的思想方式的产物，并且始终与理性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古希腊的思想家们相信，政治世界与整个世界的其他部分一样存在着某种本质与规律，这种规律在古希腊就被称为“自然”，它可以通过理性的探索为人们所了解和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法”也就是政治世界的某种被发现的本质规律。在希腊政治思想中，与自然相对立的是“习俗”，是历史上流传下来并且仍然在政治生活中起作用的各种传统的观念与制度。它们常常是不合理的，因为它们体现的不是理性而只是“意见”。对于理性与意见的差异，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进行了非常生动的描述。政治思想的任务，就是把人们从“意见”的支配之下解放出来，并使之服从理性亦即所谓的“自然的”规律与法则的支配。自然法的观念在古希腊之后一直成为西方政治思想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并且成为人们对于现实生活中不合理的因素进行批判的重要工具，也成为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内在地包含于自然法观念

中的那种在现实政治之外存在着某种更符合于人的本性的政治与法律秩序的观念,也成为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进步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

除理性与逻辑的基本思维方式之外,古希腊政治思想从其主要内容来说则是希腊城邦这一十分独特的政治实体及其政治实践的产物。希腊城邦的存在前后有几个世纪的时间,上百个小国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基本上能保持他们各自独立的存在,而不是在相互之间的战争中被消灭与兼并,并且最终形成几个大国(这是东西方历史上常见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对于这一奇迹的原因,历史学家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这并不是我们现在关注的对象。古代希腊城邦由于基本上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从而也就能够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内以相对完整的方式完成一系列的政治演变。城邦较小的人口与地理规模当然是这一演变的速度相对比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之外,由于各个城邦的演化速度并不相同,结果在同一时间内人们便可以找到处于不同演化阶段的城邦。也就是说,本来是时间的过程,在古希腊各城邦之间却以空间的方式体现出来了。这种演化本身不仅为人们考察政治过程的本质与规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而且为政治思想家们的思考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素材。古代希腊政治思想中关于政体体制的理论、关于政体与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的理论都十分发达,特别是经亚里士多德总结和发展的关于政体及其划分标准,以及关于混合政体的理论,都形成古代思想中一种独具特色的现象,成为后来西方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这与古代希腊独特的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

古希腊政治思想最后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关于民主的一种共同体式的观念。虽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些古希腊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当中,民主并没有多少正面的内容(在柏拉图看来,民主恰恰正是一种违背了政治理念的政体形式),但是,古希腊,特别是雅典的民主制度以及主要是政治家对于民主

政治的称颂，却使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成为后世众多思想家理想的家园。至于这种政治模式中所包含的公民个人与共同体的高度一致性（“人是城邦的动物”是这种一致性最典型的表述），又使后世那些政治共同体的探寻者，包括卢梭、黑格尔和尼采一直到汉娜·阿伦特等等，都对古希腊抱着一种难以释怀的深深的迷恋。应该说，民主制之所以在古代希腊城邦出现，其重要原因也正是城邦独特的人口与地理环境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政治理想的产物，后世很多民主政治的论述者因此把公民们能够彼此相识作为直接民主制的一个基本条件。不过，古代希腊政治思想中关于政治民主的观念与现代的民主政治理论之间，存在着某种根本性的差别。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古希腊思想中缺乏作为现代政治理论基础的关于权利的观念。西方政治思想中权利观念的出现与成熟，必须归因于古罗马、基督教和古代日耳曼思想的影响。

罗马是古代希腊文明的继承者，但一方面，它继承的并不是希腊文明的全部，另一方面，它又为希腊文明增添了许多原来所没有的内容。罗马在其城邦时期结束之后，无论是在共和还是帝制时期，与古希腊城邦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其人口与地域都要无可比拟地大得多。这一事实决定了在罗马的政治生活中民主这种政治制度根本不可能被采用，因此希腊人关于民主政治的种种思考在罗马基本上便没有得到继承。另外，罗马这样一个地跨欧洲、亚洲和非洲三个大陆的庞大帝国的建立，以及当时它与世界的其他政治实体之间交流的缺乏，也导致了另外的一个结果，那就是对于比较政治体制的研究所需要的基本素材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因此，关于政体的理论，在罗马从共和制过渡到帝制后一段比较短暂的时期之外也不再吸引罗马人的注意。罗马的政治学家关注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政治道德的问题，即在一个庞大的国家，如何能够保证国家的官员与民众能够以国家而不是个人的利益作为其行动的基本出发点。当然，公民道德的问题在希腊城邦时期也存在，不过提

法并不相同。古代希腊人对于这个问题提供的两个解决方案，一个是民主制，另一个则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制度，两者对罗马人都不适用。罗马人的办法，是在完善各种法律制度的同时强调一种贵族的道德，这样一种基本思路被称为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后来在 16 至 18 世纪的西方政治思想中发挥了重要影响。

与古希腊相比，也可以说罗马人在理论创造上缺乏天才和热情。老卡图式的罗马传统道德的捍卫者们反对希腊文化，认为它是一种浮华不实的东西，罗马人对它的接受将造成对简朴节制的传统美德的腐蚀。帝国时期的大多数罗马贵族则走到了另外的一个极端，完全沉溺于物质的享受。罗马对于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最大的贡献是它的法律制度与思想，其中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其对个人权利和利益的保护，对于公与私的界限的初步划分；二是它所体现的平等的原则。前者大概与罗马作为一个主要依靠农业的国家，从而必须保证农业生产者的土地所有权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有关。这种对个人权利和利益的保护在西欧封建社会后期被极大地加以发挥，成为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在平等的观念方面，虽然古希腊也强调公民之间的平等，但作为人的平等观念却是城邦时期的希腊人完全不承认的（亚里士多德明确表示奴隶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罗马的平等观念受到希腊城邦衰落时期斯多葛学派以及基督教的平等思想的影响，也是庞大的罗马国家这一现实存在的结果。与希腊城邦时期一个民族的人被划分为不同城邦的公民并享受由各个城邦赋予的不同的公民权利不同，罗马时期不同民族的人成为罗马的公民，权利便超越了地域与民族的界限而成为一种普遍的权利。罗马时期萌发的这种普遍平等的权利观念在近代被发展为普遍人权的理论，对于西方政治思想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自明了。

罗马帝国和封建社会时期基督教会欧洲的存在，也对于西